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课题编号 2017B65）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

拟声词英译研究

黄生太◎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前 言

本书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编号 2017B65）。按照惯例，博士论文出版由导师作序名正言顺。无奈恩师已驾鹤西去，序言已成为永远的遗憾。虽然一些同门师兄已成为外语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序言同样可为本书增色，本人却固执地坚持留下这份遗憾，以纪念先师王德春先生。

《红楼梦》修辞研究不是新课题，翻译研究也正盛行，利用穷尽性的语料对某一辞格进行系统研究，还不算毫无意义。由于《红楼梦》版本复杂，底本文字上的差异必然对译文对比带来巨大困难。加之两个译本的译者都没有完全依据某一底本，而是不同程度地对底本进行了修正，更增加了译本比较的难度。作者尽量择善而从，使用相对比较接近底本的版本，并参考诸多抄本影印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采用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这一版本虽然也有缺憾，但便于读者核查。撰写论文初期，霍克思闵福德译本的底本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出版的启功注释版，这是译者当时能找到的最接近译文的底本。2012 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圣宇博士精心校对的汉英对照版，作者又重新核查过霍译本的所有拟声词及其译文。虽然这两个版本的底本都不是完全字字句句对照的准确底本，但也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总体上说，这种版本的选择能基本反映原著修辞艺术和译文特色。

本书从语义场的角度把拟声词视为摹拟声音的类义词，认为拟声词来源于拟声造词，是一种按照词的音义关系区分的类别，不是语法上的词类。拟声是即按照人们感知到的各种声音的特点，以发音近似的语言符号摹仿而成的词。以《红楼梦》中所有拟声词为语料，分析了这些拟声词在语音、语义、语法上的特点，拟声修辞效果，英文译本中的翻译策略，以及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思闵福德译本翻译拟声词的异同。杨戴译本对拟声词主要采取对译，发挥英语拟声词的优势；霍译本发挥译者创造性，积极

创造拟声词进行翻译。尤其在诗歌翻译中，霍译本努力翻译拟声词，又追求诗句押韵。此外，译者积极使用英语拟声词，以拟声词翻译原文无拟声词的句子，增强译本的艺术性。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本人得到了诸多帮助；既有来自同时求学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同门、朋友批评，也有来自工作单位的领导同事关心。此外，本书的顺利出版离不开出版社编辑罗在伟老师精心策划、责任编辑孟媛老师细心校对。

在上外求学三年期间，我聆听了冯庆华教授的《红楼梦》翻译课程，初步萌发了选题的文本方向；在查明建教授主持的多次学术沙龙、高层论坛中了解到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方法；从语言研究院举办的系列博士沙龙中领略了许多青年才俊的缜密思维和逻辑论证。

论文答辩中，复旦大学高天如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何刚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杨金华教授对论文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为论文修改指明了方向。湖南师范大学廖光蓉教授对动物词隐喻研究孜孜不倦、小心求证的科研态度，为我进行语料分析提供了榜样。上海大学冯奇教授是我的硕士导师，引领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并至始至终关心着我的学术成长。

感谢浙江农林大学各级领导的关心。李明华教授、程云行教授、戴运财教授、张敏生教授和章晓雯副院长一直鞭策我努力前行，并在工作中提供了许多帮助。

妻子陶友莲女士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安心工作学习，完成硕士博士学业。转眼间儿子黄行健已经从一个电脑前好奇的围观者成长为挑战父母权威的初中生，本书的出版算是给他那些年里曾经一直追问“老爸在干嘛？快来陪我玩。”的最好回答。

最后要感谢远在湖南乡下的父母。

黄生太

2017年1月

目 录

1 引 言 / 001

2 拟声词研究综述 / 008

- 2.1 拟声修辞与拟声词 / 009
- 2.2 拟声辞格和拟声词研究现状 / 011
- 2.3 拟声词的分类 / 020
- 2.4 拟声词的临时拟声现象 / 024
- 2.5 英汉语拟声词研究方法的异同 / 024

3 《红楼梦》拟声词特征分析 / 026

- 3.1 《红楼梦》拟声词的音节分布 / 027
- 3.2 《红楼梦》拟声词的语音结构 / 035
- 3.3 《红楼梦》拟声词的摹拟对象 / 038
- 3.4 《红楼梦》拟声词的语法功能分类 / 044
- 3.5 文章体裁分类 / 050
- 3.6 意义转移的拟声词 / 051
- 3.7 本章小结 / 053

4 《红楼梦》拟声词的修辞效果 / 054

- 4.1 揭示人物性格 / 054
- 4.2 渲染环境气氛 / 075
- 4.3 描写事物情状 / 084
- 4.4 本章小结 / 087

5 《红楼梦》拟声词翻译 / 088

- 5.1 《红楼梦》的英文翻译 / 088
- 5.2 翻译的单位与拟声词翻译 / 091
- 5.3 拟声词的翻译策略 / 095
- 5.4 本章小结 / 138

6 结 语 / 139

参考文献 / 140

附录 A 《红楼梦》拟声词原文及英译汇总 / 152

附录 B 拟声词的语法功能一览表 / 223

1 引言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的皇冠，乾嘉年间民间就流行着“修辞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自《红楼梦》1754年问世以来^①，两百多年间研究者兴趣不减，从社会学、医学、建筑学、文艺学、语言学等诸多方面展开研究，或褒或贬。但其作为一座文学艺术的丰碑，魅力不衰。我国的红学研究经历了索引派、考证派、新考证派，现在出现了各种对《红楼梦》故事的附会观点，偏离文本研究，而从只言片语，对人物和情节进行套用，以小说的情节研究历史人物，对文本并不重视。张庆善（2007：259）指出“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做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

目前的《红楼梦》研究，大致可分为文本外与文本内两个方向。文本外的研究有的研究作者身世及创作经历，有的研究《红楼梦》的成书历程、版本衍生，有的研究它的社会影响、文学贡献。文本内的研究主要侧重小说的艺术成就、人物形象。有的研究书中人物的原型，有的研究人物的命运，有的研究书中出现的服饰、器物、药理、园林等，不一而足。而对语言的研究，有的主要侧重个性化的对话对人物形象的作用、常见的辞格、人名的来源及其含义等。就语言研究而言，《红楼梦》拟声词研究，在研究《红楼梦》语言的论著中有过零星论述。另外，对汉语词汇、语法研究的论著中也有零星的语料来自这部小说。《红楼梦》拟声词研究更多来自对小说修辞艺术的研究。这些以《红楼梦》为语料来源的语法修辞学论著中零星成果，给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而对《红楼梦》拟声修辞的英译散见于取例于《红楼梦》英译本的翻译研究类文章中，以及各类专门研究英译本辞格、专名翻译的论著中。这类论文或著作，不乏真知灼见，但讨论不够深入，系统性不强，无法了解全貌。

① 这是通行的说法，即现存最早抄本甲戌本石头记问世的时间为乾隆十九年（1754），可参见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第1页、周汝昌《献芹集》第64页、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第54页。

早期的《红楼梦》研究受索引派、考据派影响,更多根据各个版本的批文评论,研究写作背景、作者生平、作品的形成经过、各版本之间的关系等,严格说来是文本之外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文本内的研究受到红学界的重视。通过文本的语言研究,分析人物形象、作品的社会意义、作品的艺术成就或美学思想;也关注语言风格或少数词格的应用。研究《红楼梦》语言的文献,除了《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等期刊中的文章及红学会议论文外,还相继出现了几部研究红楼梦语言艺术的专著和论文集。此外,《红楼梦》研究的资料汇编也收录了一些早期的宝贵资料。这一时期,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红楼梦》的语言风格、民间俗语、词义句法几个方面。从各个时期的研究来看,《红楼梦》语言研究仍然具有“面广、点散”的特点。周中明(1982/2007)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是第一部研究《红楼梦》语言的专著,收录了作者16篇论文,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红楼梦》语言的风格美、哲理美、寓意美、境界美等多种表现形式进行了研究。但因为其研究的出发点是学习《红楼梦》的语言技巧,提高欣赏和写作水平,又加之是专题论文集,深度仍然不够。林兴仁(1984)《〈红楼梦〉的修辞艺术》是研究《红楼梦》修辞的专著,收录了作者各个时期撰写的36篇文章,通过大量的实例,从语音、词语、句式、修辞方式四个方面论述了《红楼梦》的修辞成就。但因为该书是为普及修辞知识而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难免失于简单”。梁扬和谢仁敏在专著《红楼梦语言艺术研究》中,对红楼梦的语言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对已有成果取长补短,采用综合法,按照语言功能从叙述语言、描写语言、人物语言三个方面对《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该书研究的内容比较全面,但没有对修辞进行专题论述。此外,还有些角度新颖的研究,如李萍(2007)研究了红楼梦的酒令语言,张伟(2003)研究了其中的对话语言及其翻译,金力(2006)研究了模糊语言的翻译。耿静颖(2006)从词语和词格的角度探讨了《红楼梦》的语音修辞,主要讨论了几化、拟声、双声、叠韵、叠音等修辞手段及其效果,其中的一些结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栾妮(2009)对《红楼梦》的修辞造词进行研究,主要讨论了比喻、借代两种,对拟声也有所提及。这些论著由于研究对象不是拟声词,研究仍可深入。

台湾地区《红楼梦》的研究内容和角度与大陆很相似。《红楼梦》文本语言研究及翻译传播研究,因为资料收集不易加上语言能力,还是有待开

发的研究领域^①。

《红楼梦》的语言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利用语料库研究《红楼梦》由来已久,在21世纪得到大幅发展。

《红楼梦》很早便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标准材料,也为汉语语法研究者重视,成为语法研究的重要语料来源。王力先生194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法》就主要以《红楼梦》语言为例,只是“有时候,《红楼梦》找不着适当的例子”,才暂时自造或在《儿女英雄传》中找些来充数。王力对这些例子进行了细致的语法分类,这大概是最期的《红楼梦》语料库雏形。在该书第三十六节“拟声法和绘景法”中,作者指出“拟声法和绘景法似乎只是修辞学里的事,其实和语法也有关系”,“拟声法就是摹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王力,1985:296)随后作者利用近30个例子分别论述了五种拟声法。1952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统计了《红楼梦》的一些词汇,证明《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在语法上惊人地相似。(转引自陈炳藻,2002:278;蒋绍愚,2005:5;葛锐,2007:186;胥惠民,2008:249;施建军,2011:36)

计算机技术大力推进了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利用计算机检索和统计语料成为新型语料库的必然手段。1980年6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陈炳藻应用统计方法分析《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词汇,得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为同一作者的结论。^②(陈炳藻,1980/2002:276)虽然这一方法和结论尚存在争议。^③但通过现代技术分析统计研究小说语言的方法,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张惠充分肯定了陈炳藻研究方法的意义,认为这“是对余英时‘红学’危机的突围”,“从事实上开创了一条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在方法论上是一个突破”。(张惠,2013:147)这种方法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兴趣,争相尝试。深圳大学于1986年率

① 陈怡君 石头渡海——近三十年台湾地区研究《红楼梦》之硕博论文述要 红楼梦学刊[J].2007(1)。

② 周策纵.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第20页“多方研讨《红楼梦》——首届〈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编者序”透露陈炳藻“用了更复杂的统计公式和电脑计算了二十多万语汇的出现频率,写成博士论文”,在研讨会上宣读的是博士论文的摘要。

③ 参见陈大康.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与陈炳藻先生商榷[J].红楼梦学刊,1987(1):293-318;胡文彬.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述评[J].学习与思考,1982,(2):52-57;许豪炯.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几个争议的问题[J].学术月刊,1981,(3):45。

先建成《红楼梦》电脑检索系统,进行了广泛报道。随后,开发人员应邀参加了联邦德国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第一届中文信息处理研讨会,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①。张卫东、刘丽川利用这一平台探讨了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语言,指出这两部分在用字、用词、回尾处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后四十回较前八十回更具有京腔味儿。(张卫东、刘丽川,1986;刘丽川、张卫东,1986)李贤平(1987)通过模式识别和探索性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识别47个虚字的出现频率,得出与陈炳藻比较接近的结论。李贤平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并非曹雪芹原创,后四十回是曹家亲友整理曹雪芹原稿并加工补写而成。同样,这一结论也遭到周广曾(1992)、彭蕴辉(1992)等人的质疑。

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为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语料库被广泛应用于语言研究、词典编纂,并紧密地与翻译结合,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范式。冯庆华(2008)从辞格、文化词汇、习语等三方面系统论述了霍克斯闵福德一本特色,与杨译本相映衬所凸显的译者风格。刘泽权(2012)总结了自己创建《红楼梦》中英文语料库的经验,择要介绍了应用平行语料库开展译本研究经验。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建立为后续研究创造了条件,刘以此开展系列研究并筹备编纂《红楼梦汉英文化大辞典》。(刘泽权,2016)

《红楼梦》的拟声修辞是红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已经成果不菲,也有不少精辟的结论。但这些研究比较分散,主要见于研究各类修辞格翻译的文献中,重复较多,创新性系统性不够。最早关注《红楼梦》拟声词的是脂砚斋,我们在早期抄本中发现至少两处脂砚斋对拟声词的评价。一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二十六回的一个拟声词“咕咚咕咚”旁,脂砚斋写下了“活现,活现之文”的评语。脂砚斋指出这一处拟声词对刻画人物形象所起的作用。后来涉及拟声修辞的论著中很多引用了这一条例证。另外一处是庚辰本第三十八回,贾母携王夫人凤姐等去大观园赴湘云的赏菊诗会,经过通往藕香榭的竹桥,在桥上王熙凤搀着贾母说:“老祖宗只管迈大步走,不相干的,这竹子桥规矩是咯吱咯喳的。”脂砚斋评道:“如见

① 参见朱鸣学,赵侠.《红楼梦》电脑检索系统在联邦德国[J].深圳大学学报,1988,Z1:64;亦可参见曲一曰.《红楼梦》电脑检索系统评介[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4):60-62;钟嘉陵.深圳大学研制成功《红楼梦》电脑多功能检索系统[J].辞书研究,1986,03:39.深圳大学推出大型多功能《红楼梦》电脑检索系统[J].语文建设,1986,04:60。

其势，如临其上，非走过者必形容不到。”在这里脂砚斋指出了拟声词营造的现场感，让人感到如临其境的修辞效果。太愚^①在《红楼梦的语言》^②一文中，例举了吱喽、咯瞪、当、啪、咈咈咈咈、嘟嘟囔囔、咯咯吱吱等拟声词，认为作者擅长使用这类“活泼逼真的特殊用语”。据张玉萍（2005）^③，日本熊本大学的野口宗亲曾对《红楼梦》与《金瓶梅》的象声词进行比较研究，这是一篇对红楼梦中拟声词进行专项研究的论文，可惜笔者没有读过该论文，详情不得而知。另外，耿二岭先生对《红楼梦》拟声词进行过比较详尽的研究，可惜没有专文刊出，仅在《汉语拟声词》一书中提供了几种常见格式的拟声词的数目，共计164个，而无词汇表，详情不得而知。

《红楼梦》的英译，最早出现于1830年，仅译了第三回的一些片段，目的是为了吸引外国人学习汉语。其后有多种节译本、摘译本、全译本出现。外文译本的出现，逐渐引起国内外研究者对于这部小说的注意，从而开始了《红楼梦》翻译研究。1929，徐生评述了王际真译本，认为王译本“甚能保存原属之精华，文字亦通妥”、且“译笔明显简介，足以达意传情”。这大概是现今见到的最早评论《红楼梦》英译语言风格的论述，但毕竟只是节译本，而且译本是“为西方读者而作”，论述较为浅显。至今有12个英译本，其中两个全译本间隔不久相继面世^④，即霍克思、闵德福合译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简称霍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 *The Dream*

① 即王昆仑的笔名。

② 最初发表于1947年9月《国文月刊》第五十七期。参见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1240-9页。另外，署名宋哲，发表于1965年《新天地》八月号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一文，与太愚一文雷同，参见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第234-46。不知两个名字是否王昆仑先生的不同笔名。

③ 张玉萍《红楼梦》语言学论著索引（1987—2005）红楼梦学刊[J]。2005，（4）294-304，野口宗亲文章题目为“清代北京话的“象声词”——《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日）野口宗亲/熊本大学教育系纪要人文系，1993（31）。

④ 目前出版的是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全译本，但有第三个全译本的说法。参见王金波，王燕。被忽视的第一个《红楼梦》120回英文全译本——邦斯尔神父《红楼梦》英译文简介[J]。红楼梦学刊，2010，（01）：195-209。另外，20世纪70年代初，周策纵先生也提到有个去世的英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参见周策纵。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第268页。

of the Red Mansion (简称杨译本)。两个全译本的出现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对《红楼梦》英译研究的兴趣。霍译本第一卷出版不久,宋淇(1975)撰文^①,肯定了霍译本的优点,同时从文化差异、双关修辞、底本的选择、原文理解等方面对霍译本的得失进行了讨论。指出霍译本最大的缺点就是底本依据本身与原作之意相左的程乙本,其次是在翻译既富于民族文化又揭示主题的“红”“绿”两个的颜色词时的失当。周珏良(1980)先生大概是国内较早关注霍译本的学者,虽然只读到前两卷,他认为霍译本较成功地传译了红楼梦的各类语言风格,修辞翻译比较成功,觉得“霍译本最大的好处在于能传原属之神,读来往往使读者不觉它是翻译作品”。张培基(1979)比较深入地讨论了汉语拟声词及其英译,所用例子多数来自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有少量例子来自《红楼梦》,是较早关注《红楼梦》语音修辞手段的学者。通过几个英译本的对比讨论了霍译本第一卷的习语翻译。相比而言,因为编辑出版行为的干扰,杨译本遭到冷遇。研究者一般推崇霍译本,而把杨译本作为参照译文。张培基只在文中提到杨译本的书名翻译,以与霍译本形成对照。韩忠华(1982/1986)研究了杨译本中人名、书名、习语的翻译,指出杨译本准确选择词语、灵活运用句型的两个显著特点,并指出一些翻译失当之处。20世纪90年代后,《红楼梦》英译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双关、隐喻、仿词等各种修辞格,以及章回目录、诗词曲赋或对联判词各类文体、成语习语、人名专名的翻译。研究视角逐渐开阔,从文化意义、读者接受、译者审美及修辞语用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刘泽权等建立了《红楼梦》英汉平行语料库,为研究其英译提供了便利,促进了英译研究。刘世聪先生主编的《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收录了一批高质量的红学专家论文及研究《红楼梦》翻译的论文,包括6篇语言与语篇研究论文、14篇文学与修辞研究的论文,论题涉及人名、称谓、颜色词、特色句式、个性化人物对话等对象的翻译,语音修辞没有触及。冯庆华主编的《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理论扎实、内容丰富、研究目标明确。全书分15个专题,通过对比杨译本与霍译本,对其中的修辞翻译论述比较全面。辟有专章讨论两个版本的习语、练字、措词、炼句、语音修辞、语型修辞、语义修辞等修辞现象的翻译,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在“语音修辞的翻译”一章中,分门别类地

① 参见宋淇“试评《红楼梦》新英译”,载胡文彬,周雷编.香港红学论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第356-425页。

讨论了谐音、谐音双关、语音飞白、摹声、儿化韵等五个方面的翻译。其中不乏典型例子，分析也比较准确。但是作者更多地关注译文比较与赏析，没有应用英汉语中的语音修辞的理论，更没有展开修辞对比，理论阐述略显薄弱。冯庆华从译者文化背景对译作的影响的角度对比杨译本与霍译本，其中也研究到谐音修辞。肖家燕立足于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选择了《红楼梦》中的六组隐喻概念进行了专题研究，开创了《红楼梦》专题研究的新路径，为《红楼梦》翻译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李亚丹、李定坤（2005）在著作中的“声色美”一章中讨论拟声修辞格，对一些取自《红楼梦》的例句进行了分析。

在本书的讨论中，采取拟声词这一术语。但在引用其他人观点时，如果作者使用象声词，为了保持忠实准确，亦不作修改，沿用原文献术语。另外本文采用摹仿一词，但引文中可能出现模仿、仿拟等词，不作更改。评价引文时，针对引文用词习惯，采用引文中原有术语，不强行使用本文所使用的“拟声词”或“摹仿”。

本文用语言学原理研究《红楼梦》文本及译本，择取《红楼梦》中的构成拟声辞格的最基本元素——拟声词，自建语料库，进行英汉语对比研究，并通过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与霍克斯、闵德福翁婿译本进行译文比较，试图借鉴汉语拟声词研究的成果，以《红楼梦》语料为主，进行英汉拟声词对比研究，探讨拟声修辞翻译的一般方法，通过比较，寻找两个译本的在拟声词翻译及对拟声修辞效果传译的异同，研究两个译本的特点。

2 拟声词研究综述

拟声既是一种构词法又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格,一般认为拟声相当于英语的 *onomatopoeia*^①。同样,在英汉词典中, *onomatopoeia* 也往往与“拟声,拟声词”或“象声,象声词”互译。根据刘英凯(1998: 143)的观点,英语除了 *onomatopoeia* 一词外,还用 *onomatopoetic word*, *imitative word*, *echo word* 以及 *echoic word* 表示拟声词。李国南(2001: 5~7)考察了英语中 *onomatopoeia* 一词的来源和汉语拟声的早期研究,认为拟声不但是一种重要的构词方式,也是一种古老的修辞格,在古代诗歌中非常常见。在英语中, *onomatopoeia* 既可指一种拟声修辞格,也可指构成这一辞格的拟声词。我国修辞界也一般使用 *onomatopoeia* 指代拟声词,如张培基(1964: 5)使用 *imitative words* 一词表示“拟声词或象声词”。拟声修辞常常借助拟声词(其实不一定是现成的词,也可能是临时组合的一串字或符号^②),我国修辞学界讨论拟声修辞时,并不论述拟声修辞与拟声词的关系,而是直接讨论拟声词的结构特点、语法功能、修辞效果,如陈望道(1933: 176)、王力(1951: 183)、张弓(1963: 53)、胡曙中(1993: 376)、李国南(1999: 155; 2001: 5)、王希杰(2004: 163)等。对于拟声在语法和修辞上的关系,王力先生(1951: 183)曾说:“拟声法和绘景法似乎只是修辞学里的事,其实和语法也有关系,因为这两种修辞学上的风格是需要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来表达的,而特殊的语言形式却是属于语法范围的。”这种观点符合当时汉语修辞语法研究不分家的传统。

① 持这种观点的有:

张其春. 翻译之艺术[M]. 台北: 台湾开明书店, 1966. p5。

胡曙中.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p376。

徐鹏. 英语辞格[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p394。

刘英凯. 英汉语音修辞[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p143。

李国南. 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p155。

李国南. 辞格与词汇[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p5。

② 如鲁迅在《无常》中写道:吹起来, *Nhatu, nhatu, nhatu—nhatu—nhatututuu* 地响,所以我们叫它目连头啍头。

2.1 拟声修辞与拟声词

拟声也称摹声、象声^①，是中国修辞研究的传统内容。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现代修辞学奠基人陈望道先生把摹声确立为一个辞格进行研究，指出“摹状是摹写对于事物情状的感觉的辞格。有摹视觉的，也有摹听觉的，而摹写听觉的尤为常见。所以普通就称它为摹声格。摹声格所用的摹声词，概只取其声音，不问意义。”陈望道（1933：176）认为：一、摹声是摹状辞格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摹声辞格主要借助摹声词而构成；三、摹声词的主要功能在于声音相似，至于摹声词中单个字的意义，对句子不产生影响。其后，诸多学者论述拟声辞格，都继承了这三个观点。

对于拟声词模拟的声音与现实世界声音的关系，学者普遍认为拟声词对声音的模拟并不完全相像。索绪尔指出拟声词“只是某些声音的近似的，而且有一半已经是约定俗称的模仿。此外，它们一旦被引进语言，就或多或少要卷入其他的词所经受的语音演变、形态演变等漩涡……它们已经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某些特性，披上了一般语言符号的不可论证的特征”（索绪尔，1980：105）。Lyons（1977：101）同样指出：“即使拟声词的词汇形式，也必须符合特定语言的语音系统，而不是直接地模仿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声音。”^②王力认为拟声法（onomatopoeia）是属于修辞学的范围，但是和中国的构词法、造句法大有关系。拟声法模拟得像不像，和语言没有关系。拟声法只是某一些人听起来觉得是这样，于是在某一族语或某一方言里相沿用这一个词，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因此，同是一物之声，在各族语可以译成种种不同的语音……中国各地的拟声法也不尽相同。（王力，1951：183）赵元任（1980：40）也认为，“象声字并不象声”，“语言跟对象的关系，甚至于在象声字，也是完全是任意的”。张弓（1963：53）指出：“拟声词只是按照感觉，作大体的描拟，不能完全与实物的原声音相符。”可见，虽然拟声词可以产生拟声效果，但拟声词对声音的模仿是近似的，甚至是任意的，具有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点；不同语言的拟声词受到各自语音系统

① 张其春又称作谐声、谐音。张其春，翻译之艺术[M]。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66. p5。

② even in onomatopoeic forms, since they are made to conform to the phonological systems of particular languages, rather than being directly imitative of what they (or, more precisely, the lexemes they encode) stand for. (LYONS J. Semantics vol1.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的制约,适应语言语音搭配规律;拟声词不是声音的复制,而是语言加工的产物。

拟声词用于摹仿各种声音。汉语的拟声词在文字形体上有一些特征。大致看来,汉语中用于模拟人的说笑啼哭、动物鸣叫的拟声词,多数用口形旁,如“喃喃”“叽”“嗡嗡”“喔”;模拟自然界其他声音的,一般按照对该发声体的认识,赋予金木水火等基本属性,水声雨声的,多用氵旁,如“沥沥”“汨汨”,模拟其他硬物声响的,多以钅为形旁,如“锵”,击木声的“梆”^①;也有辅之以其他属性的,如模拟风声的“飐”。模拟非生命物体的拟声词也常常以口为形旁,如“哐”“咔”“叮咚”等。张其春(1963:11)所言“国语拟声,多从口旁”,确实有一定道理。

一般情况下,拟声辞格中总有摹拟声音的拟声词,修辞效果也决定于拟声词和所模拟的声音之间是否相似。由于辞格要适应语境,拟声辞格中的拟声词也要与上下文所营造的情景相适应。拟声修辞中的拟声词不管摹拟的相似程度如何,一般都要交代发声体,不能使用拟声词,却不指出是什么物体发出的声音。只有在发声体明确的情况下,把拟声词摹拟的声音与发声体联系起来,才能完成拟声词的修辞作用。发声体可能与拟声词紧密相连,也有可能要从另外的句子中才能发现,甚至要从不同段落、小说的不同章节中才能发现^②。

拟声辞格并不是最普遍的修辞现象。一是由于常用的拟声词数量有限,而拟声词的拼写也还没有严格规范,有些使用者在使用拟声词时尤其慎重,以避免造成语病或错误。另外拟声词的使用还受到文体特点、地域差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口技中的拟声方法一般很难用一种语言中语音形式表现出来,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词汇形式,这种拟声方法很难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不研究口技中的拟声法,只研究语言体系中的能用一种语言的音系表现出来的词汇。通俗文学中拟声词使用比较普遍,尤其是儿童文学、民间传说、评书和相声脚本等。这类文本主要用于口头表演,有时拟声修

① 也有“梆”字。

② 尤其在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中,往往使用拟声词留下悬念,以待下回分解,如《红楼梦》第七十二回结尾处写道“赵姨娘方欲说话,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惊不小。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第七十三回继续写道“话说那赵姨娘和贾珍说话,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问时,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塌了屈戌了掉下来。”

辞并不使用拟声词,而只使用一种比较笼统的表达发声的方式,如“××叫”“××响”的形式。如《红楼梦》第八十八回写道“只听得远远的鸡声响了,二人方都穿衣裳略躺了一躺”;第四十一回写道“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有时,甚至只描写了某一物体的某类动作,而发出的声音需要想象,但这种声音所产生的效果相当于拟声词的效果。如描写下雪的情景,可能只是描写雪粒儿敲打着玻璃,但我们可以想象敲打时的噼噼啪啪的响声。如《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写道“因弯腰拾了一块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响,一个大圆圈将月影荡散复聚者几次”。因此,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有时候为了达到原文的修辞效果,可能采取一种补偿或补充相关信息的方法。

2.2 拟声辞格和拟声词研究现状

对于拟声辞格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修辞界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历史窥见一斑。如前文所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摹声已经进入修辞研究者的视野,一直继承下来。至于各种与摹仿有关的辞格种类,这些辞格的包含关系,观点也不统一。先是陈望道先生的摹状辞格理论,认为摹状包含摹视觉的和摹听觉的两种,但使用了“摹声格”一词,并指出摹声格尤为常见,摹状格通常就称为摹声格(陈望道,1933:176)。王德春(1987:107)认为摹绘又名摹状,是总的辞格名称,分摹声、摹色、摹味、摹景象、摹形态、摹情态六种,而摹声又叫声喻法,利用象声词来增加叙述的形象性和真实感。王先生的六种辞类,更为具体详细,为多数研究者认可。如唐松波、黄建霖(1989:600~601)认为摹绘是利用语言手段描摹客观事物的声音、色彩、气味、情状等。相应的,摹绘包括摹声、摹色、摹味、摹状,但他们认为,摹声辞格使用拟声词而成。他们认为,运用摹绘能大大加强语言的感情色彩、直观性、可感性和表现力,能直接唤起读者感同身受的真实体验,对于渲染环境的气氛,刻画人物的性格,有着十分明显的修辞效果。

拟声词的研究,长期以来与“拟声词”“象声词”混用。早期的研究主要关心拟声词(象声词)的词类归属、语法地位及其与叹词的关系。这里从两部常用词典收录两个术语作为词条的情况,考察两个术语发展历史。

《现代汉语词典》各版本的收录情况见表2-1。

表 2-1 《现代汉语词典》各版本的收录情况

出版时间及版次	象声词	拟声词
1973 年试用本	√	
1978 年第 1 版	√	
1983 年第 2 版	√	
1996 年修订第 3 版	√	
2002 年增补本	√	
2005 年第 5 版	√	√

从上表可见,《现代汉语词典》一直采用“象声词”的说法,拟声说法是新纳入的,但应该注意的是,《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下文简称《现汉 5》)已经采用“拟声”标注词类。

《辞海》的收录情况有所不同。《辞海(1989 缩印本)》既收录“象声词”,同时又收录了“摹声词”,并收录作为辞格的“摹状”:

象声词 也叫“摹声词”,摹仿自然声音构成的词。如摹仿流水声的“潺潺”,摹仿布谷鸟叫声的“布谷”(第 528 页)。

摹声词 即“象声词”(第 691 页)。

从《辞海》的收录来看,象声词是常用术语,摹声词是非常用术语。

《现汉 5》标注了 12 类词,采用拟声词这一说法,标注词性。这种做法给拟声词研究带来了极大方便。有学者对《现汉 5》的拟声词进行了专项研究。

袁明军(2007)对《现汉 5》的拟声词进行统计,发现该词典收拟声词 225 个。沈敏、郭珊珊(2006)统计同一词典的拟声词,发现在常用的 210 个拟声词中,双音节及多音节的占 68.57%。而李亚萍(2010)对高文达先生的《近代汉语词典》拟声词进行统计,计算出该词典收录了 148 个标注“象声词”的词条。通过以上三种研究,我们可以认为,拟声词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数量不少^①,值得研究。

我们把那些词汇意义中凸显声音特征的词归类为拟声词。从造词法的角度看,拟声词的意义与声音密切相关甚至仅表示声音。每一个都是音义结合的,对于一般的词来说,意义是主要的,声音只是形式,而对于拟声词而言,声音的相似性才是主要的,即声音模仿得像不像至关重要,至于

① 《近代汉语词典》收词条 13 000 (李亚萍 2010: 77)。《现汉 5》第五版修订说明,指出“全书收词约 65 000 条”。